

大躍進中的糧食問題

• 楊繼繩

一 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糧食短缺就成為十分突出的問題。原因有三：其一，用行政力量加速實現工業化；其二，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其三，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1949年以前，沿海城市麵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進口小麥。據調查統計，從1922到1930年，平均每年進口洋麥2,516,956擔，上海麵粉工業所用的洋麥佔其麵粉產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個半月用洋麥作原料。自1931年以後，洋麥入口激增，低價傾銷中國。上海進口洋麥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個月中有10個月用洋麥作原料^①。糧食部部長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曾自豪地說：「我們扭轉了50多年來依賴洋米、洋麥的進口趨勢，米麥反而有一些出口。」^②

糧食收購，說是收購餘糧，實際上國家給農民的口糧標準很低，農民根本吃不飽。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就不能讓農民吃飽。

1953年10月2日，毛澤東採納了陳雲的建議，任何人都不得做糧食買賣，農民的糧食只能賣給國家。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糧食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11月19日，政務院第194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實行糧食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命令〉中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③糧食市場由此消滅，政府壟斷了一切食品購銷。

糧食徵收是指農業稅，即公糧；糧食收購是指國家收購農民的餘糧，二者統稱「徵購」。說是收購餘糧，實際上國家給農民的口糧標準很低，按這個標準，農民根本吃不飽。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就不能讓農民吃飽，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④：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裏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劉少奇這段話雖然是在1962年講的，實際上反映了實施統購統銷以後政府的一貫態度。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除了秋收後很短時間內能吃飽以外，其他時間根本沒有吃飽過。

實施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佔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此前提高了10%左右。從表1中可以看出，1954至1955年度徵購比重最大，多收了70億斤糧食，使得農村出現了饑荒，此後兩個年度的徵購數不得不下降。由於每年徵了「過頭糧」，不得不再返銷給農村，因此每年返銷給農村的糧食高達40%以上。這些糧食在城鄉之間往返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儘管浪費，國家先把糧食抓到手比較穩妥，「過頭糧」還是年年徵。

不讓農民吃飽，就得借助政治權力和壓力推動糧食徵購。1957年，城市裏開展反右運動，農村也開展「大辯論」，其主題是「明辨糧食問題上的大是大非」。當時中央和地方報紙上發表了大量有關文章和新聞報導，例如「統購統銷好得很——駁右派份子」、「反對統購統銷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等^⑤。

表1 大躍進前糧食產量、購量和返銷量 (單位：億斤)

年度	1953-1954	1954-1955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產量與徵購					
糧食產量	3,337	3,390	3,678	3,855	3,898.2
徵購數	1,003	1,078	1,041	994	1,038.3
佔產量比重	30.1%	31.8%	28.3%	25.8%	26.6%
返銷糧		494	405	490	429
佔徵購糧的比重		45.8%	38.9%	49.3%	41.3%

資料來源：糧食部統計司1957年7月表格和糧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至1958年度不是最後數。

1958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指出，現在個別地方有些農民開始鬧糧，其中有些是真缺糧，有些是假缺糧。中央要求銷售糧食力爭不要突破計劃，收購糧力爭超額完成任務。

進入1958年，糧食購銷形勢使中央政府更加焦慮。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中發〔58〕104號)，這份文件指出，現在個別地方有些農民開始鬧糧，其中有些是真缺糧，有些是假缺糧。中央要求銷售糧食力爭不要突破計劃，收購糧力爭超額完成任務。1957至1958糧食年度最後的實際結果是，徵購比計劃增多，銷售比計劃減少。

1958年4月17到19日，中央辦公廳聽取了安徽、河北、山東、廣西、廣東、甘肅、山西、四川、江蘇、吉林、遼寧、湖南、福建、內蒙古、雲南等16個省的電話匯報，得知這些省都發生了缺糧、斷糧、鬧糧的情況。安徽130萬人缺糧；山東農村有67萬多人斷糧；廣東僅15個縣斷糧的就有69萬多人；甘肅21個縣缺糧，其中最嚴重的縣餓死735人^⑥。

二 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

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中國人也為之振奮，把工作中的特大突出成就稱之為「放衛星」。1958年的農業大躍進，報紙不斷有糧食高產

「衛星」的喜訊。實際上這些「衛星」全是假的。人們通常認為，1958年糧食「放衛星」只是下面的幹部欺騙中央。實際上，這種荒唐行為是上下互動的結果。最早是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要舉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和相互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⑦毛澤東一句話，黨報立即緊跟，馬上宣傳「豐收的例子」，就放起了「衛星」。上面有高產的希望和急切的心理，並且聽不進「保守」的意見；下面就千方百計地迎合上級的意圖。

翻開1958年6月的《人民日報》真叫人大開眼界：在一版顯著的位置，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小麥創高產的新聞，每天都不斷地為假話推波助瀾：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 億萬人民笑開顏」；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1958年的農業大躍進，報紙不斷有糧食高產「衛星」的喜訊。實際上這些「衛星」全是假的。人們通常認為，糧食「放衛星」只是下面的幹部欺騙中央。實際上，這種荒唐行為是上下互動的結果。

《人民日報》簡直是在組織浮誇競賽，後一個參賽者的「成績」總是比前一個參賽者要高，後一個吹牛者比前一個吹牛者膽子更大。進入7月，《人民日報》又開始報導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如果說上述單產是個別現象的話，下面的報導就是全面大豐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畝產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個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報》稱：「甘肅糧食增產1倍多，糧食總產量可達200億斤，比去年增長1.4倍，全省平均每人擁有糧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糧的甘肅省在糧食方面開始富裕起來了。」《人民日報》同一天還報導，全國夏糧總產量比上一年增長69%，早稻總產量比上年增長1倍。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往山東壽張縣的工作人員寫回的信，當中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調查人員是奉劉少奇之命派遣的。這句話一時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說假話的人膽子就愈來愈大，報上來的產量也愈來愈高。

黨報宣傳的這些「衛星」雖然開始有人懷疑，但是誰要提出懷疑，誰就有被打成「右傾」的危險。在基層，誰懷疑，誰就會成為辯論對象。當時的所謂「辯論」，實際是鬥爭會。著名的科學家、當時全國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錢學森，用科學的權威讓人們相信這些高產「衛星」是真的。他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寫道^⑧：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裏收一百六十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一百六十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

1959年3月上海會議期間，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問毛為何輕信糧食高產「衛星」，毛回答說，是因為看了錢學森的這篇文章^⑨。

科學家如此，官員的狂熱就更不足為奇了。1958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認為廣東水稻畝產可達一萬斤^⑩。8月11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不僅肯定了報紙上的浮誇數字，還從政治高度肯定了這些數字的偉大意義。9月26日，副總理陳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廣東番禺縣訪問記〉的文章，說他親眼看見了廣東省番禺縣畝產100萬斤番薯、60萬斤甘蔗、5萬斤水稻的事實。多年來為糧食而發愁的糧食部也高興起來。他們向中央的報告寫道：「過去我們以為糧食大量增產、糧食狀況根本好轉是十年以後的事，現在我們看，三、四年後糧食狀況就能根本好轉。」^⑪

同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在武漢對王任重說：「許多事情看來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一翻，明年還可能翻一翻，這樣我們糧食就多得不得了。」^⑫

1958年11月16日，譚震林和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兩人在聯合給黨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中說：「根據西安、廣州、南京、呼和浩特四個分片農業會議的預計，1958年糧食總產量是8,500億斤。這是經過各省、市、自治區壓縮後的數字，壓縮的幅度一般比地、縣委報的數字少10-30%。……下面報產，有浮誇虛報的，也有隱瞞產量的。經過省、地、縣三級打了些折扣，8,500億斤左右是比較可靠的；退一些講，總不少於7,500億斤，可以照此數公布。」這兩位農業領導人還樂觀地說：「1958年糧食增產較多，完成了國家徵購任務以後，可以分一部分糧食給社員，使每戶都有300-500斤儲備糧。這樣做，……減少了公社集中儲藏所引起的倉房設備等困難。」^⑬

黨報宣傳的「衛星」雖然開始有人懷疑，但是誰要提出懷疑，誰就有被打成「右傾」的危險。著名的科學家、當時全國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錢學森，用科學的權威讓人們相信這些高產「衛星」是真的。

在來自全國上下的糧食喜訊中，毛澤東對糧食狀況十分樂觀。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他高興地說：「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他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還說：「以後人民就主要吃小麥，玉米和山藥餵牲口，餵豬；豬餵多了，人民就多吃肉。」又說：「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兒。」^④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進而提出了種植方面的對策：少種，高產，多收。9月底，劉少奇到江蘇視察時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三分之一植樹，三分之一休閒」，「少種、多收」^⑤。12月，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明文規定^⑥：

過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農業大豐產的事實，把這種理論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農作物的耕地面積逐步縮減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餘的一部分土地實行輪休，種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樹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種其萬紫千紅的觀賞植物，實行大地園林化。

1958年，在來自全國上下的糧食喜訊中，毛澤東對糧食狀況十分樂觀。他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毛澤東擔心糧食多了，進而提出了種植方面的對策：少種，高產，多收。

在1958年毛澤東提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以後，8月6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和討論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人說：「過不了幾年，全國人民每年有3,000斤糧食，糧食多了怎麼辦？」在第二天的小組會議上，召集人再次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糧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經過緊張討論，中國科學院黨組把糧食綜合利用的研究任務下達給六個與化學和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停止了許多重要的研究課題，抽調了一大批科研人員，於8月25日正式啟動了糧食綜合利用課題。這些課題進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資，取得了不少「成果」。此時，研究「糧食多了怎麼辦」的科學家也餓得發慌。於是，二十多個與生物學有關的研究所的數百名研究人員被緊急動員起來，轉而進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的研究成果。1960年11月9日，中國科學院黨組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提出了〈關於大辦糧食代用品的建議〉^⑦。

三 「高產量」帶來高徵購

糧食高產的神話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徵購。大吃大喝發生在1958年秋季短暫時間，也是造成1959年大饑荒的一個原因。有些地方「吃飯放衛星」，人們「甩開膀子幹，敞開肚皮吃」，一天吃三頓乾飯。

由於把1958年的糧食總產量估為8,500億斤，公布數為7,500億斤（兩三年後糧食部公布的數字是3,980億斤，198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為4,000億斤^⑧，實際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國家的徵購指標也就水漲船高。1958至1959糧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實際徵購糧食1,113.35億斤，比上一年度多徵購了195.14億斤，增長幅度為21.25%，糧食實際產量按4,000億斤算，只比上年增长0.26%^⑨。正常年景的徵購量只有850億斤。

農民以生命的代價承擔了浮誇風的後果。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通欄標題：「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 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這是動用400多名勞動力把其他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產隊1.016畝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幹部造假，農民遭殃。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時間內，僅第二生產隊所在地河北坨的400多人口就餓死了70多人，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他公社的人見了建國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們建國一社的光，牽連我們的糧食也賣超了。」^②

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③。從1959年春天開始，農村大批餓死人。由於地方官員隱瞞和縮小死亡數字，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

1960年2月，糧食部在四川南充召開了為期五天的全國糧食廳長會議，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2月9日講話說：「四川每年都要調出大量糧食支援全國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農村食堂每人每天吃四兩糧。四川人民把方便讓給別人」。會上提出「學四川，學南充」^④。四川的官員打腫臉充胖子。1957到1960年，四川是淨調出糧食（徵購量大於銷售量）省。後來，四川省是餓死人最多的省，餓死1,000萬人。這當然與糧食高徵購有關。

河南省信陽地區餓死了100多萬人，稱之為「信陽事件」。事件發生後，中央和省委工作組於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中寫道^⑤：

1959年全區糧食產量32.58億斤，比1958年減產46.1%。而當時信陽地委把產量估計為64.27億斤。省裏根據這個產量安排信陽徵購任務為9.6億斤，比1958年多徵4,300萬斤。地委又向各縣加碼5%，徵購任務總共10.49億斤。全區完成徵購任務之後，除了種子、飼料之外，剩下的口糧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糧）。按每人每月35斤計，可吃4個月。當時沒有副食，沒有油，35斤原糧只有25斤左右糧食，也是半飢半飽。加上全區有180萬人搞水利，吃掉了相當一部分糧食。

1959至1960年度，預計全國糧食產量5,000億斤，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徵購任務為1,100億斤，銷售計劃為820億斤。然而，這個年度的實際產量只有3,000多億斤，完成徵購任務很困難。為了完成毛澤東欽定的徵購任務，官員就把徵購糧食和反右傾結合在一起，用反右傾的政治壓力徵購糧食。因此，糧食徵購任務完成得很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規。

1959年10月15日，李先念在全國電話會議上稱：「從7月1日到10月10日，共收購糧食453.8億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億斤。」他強調，收購糧食「是一場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是一場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鬥爭」，「要開展總路線的宣傳教育和對右傾思想的批判」^⑥。殘酷的政治鬥爭終於從農民那裏拿來了糧食。11月27日，糧食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字裏行間流露出喜悅之情：「今年秋季糧食徵購運動聲勢浩大，來勢猛，進度快，為往年所沒有。從

農民以生命的代價承擔了浮誇風的後果。1959年春天開始，農村大批餓死人。由於地方官員隱瞞和縮小死亡數字，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否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

7月1日到11月20日，徵購入庫已達897億斤，比往年同期多275億斤……全年糧食徵購任務預計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兩個月，打破了以往的常規。」這個報告還有其他的喜訊：糧食銷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億斤；出口調撥計劃完成了79億斤，提前34天完成了1959年的計劃；10月底，全國糧食庫存已達658億斤，為歷年同期最高峰。報告還承諾：中央確定的1959至1960年度1,075.8億斤的徵購計劃可以超額完成，各地決心很大，已安排了1,100億斤，完成1,200億斤是有可能的……^⑥

糧食部門的喜訊伴隨着農民的眼淚。1959年冬到1960年冬，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饑荒中餓死的人，有60%是死於這一年。

四 大批農民餓死了，還不承認缺糧食

農民沒有這麼多糧食，徵購自然遇到困難。1958年10月4日，糧食部黨組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今年糧食大豐收，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可是糧食購銷調運情況很不好。從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國徵購糧食268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49億斤，銷售糧食211億斤，比去年同期多22億斤。其中城市多銷10億斤，農村多銷12億斤。全國9月底，糧食庫存418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了68億斤。有17個省市庫存減少，其中津、京、遼、吉庫存最為薄弱。」^⑦

1959年2月21日，譚震林在晉、冀、魯、豫、陝、川、鄂、蘇、皖、京十省市小麥座談會的總結上說：「現在糧食問題主要是心理狀態，並不是實際上有甚麼糧食問題。河南整社還沒有結束，據說就搞出來成百億斤糧食。為甚麼這樣的豐收他們還要打一些埋伏？這是一個心理狀態。」^⑧

1959年1月27日，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寫了〈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購產私分糧食7,000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購產私分造成的。」這個報告介紹，雷南縣反覆交代兩條政策：一、糧食政策。明確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乾，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購產幹部的政策。應明確宣布購產是錯誤的，但只要坦白交代，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代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廣東省委在趙紫陽的報告上的批語中強調「去年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反購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2月22日，毛澤東對趙紫陽的報告作了長篇批示，認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購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在批語中肯定了雷南縣的兩條政策^⑨。

安徽的飢餓從1958年冬天就開始了，到1959年春天已經很嚴重了。在廣大農民因飢餓而死的時候，1959年，《經濟消息》第9期發表了來自安徽省的一篇文章，題為〈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文章一開頭就說：

為了完成毛澤東欽定的徵購任務，官員就把徵購糧食和反右傾結合在一起，用反右傾的政治壓力徵購糧食。因此，糧食徵購任務完成得很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規。

安徽省委工作組最近對桐城縣鬧糧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材料表明，目前農村的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安徽省委認為，桐城縣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一般情況，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糧食工作。

這篇文章援引調查報告的材料說：「原來各農業社購產私分的現象非常普遍，且購產數字很大，花樣也很多。有的生產隊平均畝產1,700斤，只報700斤，有的搞秘密倉庫，一個生產隊在一夾壁牆中藏糧3萬斤，另一個生產隊把五萬四千斤糧食藏在稻草堆裏；有的幹部帶頭集體私分，有一個生產小隊每戶分糧200斤。」²⁹文章認為出現大量「購產私分」的原因是宣傳工作沒做好。

毛澤東真的相信了這篇奇文中所講的情況，相信有人購產私分，相信農村糧食很多。他比一般幹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論事地反對「購產私分」，而是從所有制上找原因。1959年2月28日，他在這篇文章旁邊加了以下批語³⁰：

政策是對的，理由沒有說清楚。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年如此，1959年及往後幾年還是如此。要翻過來，變為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隊有制，需要多年時間，這是一個由小集體所有制（隊有）到大集體所有制（社有）的逐步發展過程。不認識這個客觀真理，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不能說服人。

毛澤東不是就事論事地反對「購產私分」，而是從所有制上找原因。他認識到公社所有制還不行，但還是不相信糧食不足，不相信農民挨餓，認為只要所有制調整了，糧食就會來。

這篇文章加上毛澤東的批語，轉發全國，雖然對抑制「一大二公」的「共產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使全國各地的高層幹部對糧食形勢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加強了全國各地對農民的反購產私分的鬥爭，從而加劇了農村的飢餓，死人愈來愈多。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鄭州會議上，雖然各地鬧糧食的情況不斷傳來，但中共中央還不承認缺糧。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說³¹：

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購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該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甚麼地方。這裏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在這裏，毛澤東認識到公社所有制還不行，要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但是，毛澤東還是不相信糧食不足，不相信農民挨餓，認為只要所有制調整了，糧食就會來。

高徵購指標下達以後，農民明明知道，按這個指標，口糧、飼料、種子都沒有了，可是為了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產隊的確私下藏了一些糧食，

但數量不多。中央和省級幹部過高地估計了這個數量，在大批農民餓死的時候，還不相信沒有糧食。

五 殘酷的反瞞產私分

各級領導人有了這個錯誤的估計，就繼續加大糧食徵購力度，一斤不能少，一天不能拖。基層幹部也顧不得按毛澤東所要求的從所有制上、從政策上做工作，通過反瞞產私分對農民進行暴力掠奪是一條捷徑。反瞞產私分和整風整社結合在一起，強化了政治壓力。可憐的中國農民，在深受飢餓折磨的同時，又遭受反瞞產私分的暴力摧殘。

1959年，四川省榮縣小春徵購任務沒有完成，10月2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千餘人的會議，主題是反瞞產，落實徵購任務。縣委第一書記徐某布置鬥爭說：「群眾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並批評其他地區右傾。這個會上吊打了30多名社隊幹部，10多人致殘，逮捕了3個公社幹部。10月25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產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為4,000人。會議的內容是反右傾，查糧食。這個會有30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戒備，不准外出，不准會客。樂德公社14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4人，撤職8人，受其他處分2人。該公社大小隊幹部被打的有142人，當場打死1人，打殘病死1人。縣委第一書記徐某等人提出「要糧不要人」、「要社會主義不要人」、「有糧不交者打」等的口號。會後，區、公社、生產隊又層層打人——「上級打下級，一級打一級，幹部打群眾」。縣裏召開的會計會、醫生會都發生打人事件。一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區、公社、生產隊普遍設「警察」、「監獄」、「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眾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並且普遍使用肉刑。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3人^②。

遼寧省鐵嶺泛河公社在查糧挖糧中宣布：「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誰藏一粒糧食，誰就是反革命」。有的在黨員幹部會上提出「沒有殺人的心，就購不出糧食」。公社黨委書記徐某在楊威樓召開生產隊支部書記會時，把繩子擺在桌子上，問大家：「你們認識這個東西不？有沒有糧食看着辦！」當場把藥王廟生產隊的支部書記崔鳳伍鬥爭得尿撒在褲子裏。在藥王廟召開的生產隊幹部會上，第一小隊隊長劉春林生病沒有來，徐某讓人用手推車把他推到會上「辯論」。徐問劉：「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劉只好答：「大躍進了。」又問：「人民公社優越不？」劉答：「優越。」緊接着問：「那你為甚麼不拿糧食？」購糧幹部魏某（縣農委股長）在藥王廟生產隊逼社員劉玉青拿糧，劉說沒有糧。魏就把劉綁起來讓其跪在地上，魏親自用腳踢，還令其遊街一天。劉被迫自殺，劉的老婆也逼瘋了。公社秘書李興民在城南堡生產隊立公堂，審訊逼糧。在1959年購糧過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幹部打過人，被打的88人，被「辯論」的112人^③。

在反瞞產私分中，河南省信陽地區光山縣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職幹部526人^④，在反瞞產後期打死人更多。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

基層幹部顧不得按毛澤東所要求的從所有制上、從政策上做工作，通過反瞞產私分對農民進行暴力掠奪是一條捷徑。反瞞產私分和整風整社結合在一起，強化了政治壓力。

於1960年11月28日給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加詳盡的情況，現摘抄如下^⑤：

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全社平均畝產172斤，總產1,191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總產4,610萬斤。縣裏分配徵購任務是1,200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徵購任務，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口糧搜刮一空。徵購入庫1,039萬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伙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的破壞，歸結為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六七十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戶。從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佔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絕的有780戶，佔原有總戶數的9.7%。薑灣一個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個60多歲的老太太也瘋了。

全社有社、大隊、小隊幹部1,510人，打過人的就有628人，佔幹部隊伍總數的41.5%。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幹部231名），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腳踢、凍、餓以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甘肅省定西地區通渭縣把反右傾鬥爭當作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的手段，對講真話的幹部動輒批鬥、撤職、開除、法辦。縣長田步霄到基層搞調查，回到縣裏講了真話，縣委書記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黨份子」、「小彭德懷」，多次批鬥。1959年10月29日田步霄自殺身亡，時年三十五歲。中共通渭縣委在隴川公社召開了一次整社徵糧的千人現場會，席道隆說：「要繼續反右傾，鼓幹勁，特別是在糧食問題上，無論阻力有多大，困難有多少，糧食徵購任務一定要完成，對於那些頑固不繳的要想盡一切辦法迫使其繳出來，必要的時候，我還是那句老話，要政治掛帥。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文質彬彬，要有革命的鐵的手腕和鐵的行動。」縣裏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會後，縣裏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裏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甚麼拿甚麼，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⑥。

在搜糧食過程中，「萬人整社團」對群眾採用各種殘酷的刑罰。有的公社把生產隊幹部集中起來算賬，逼着他們交代糧食藏在哪裏。有的提出「一個會議，十個戰場」的口號，把逼糧食會當成對敵鬥爭的戰場。有的公社召開萬人鬥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在這些鬥爭中，对被鬥的幹部群眾實施各種酷刑，如竹籤子插指頭、站冰塊、雪裏埋人、打夯、拔鬍子等120多種。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1,100多萬斤（大部分被「萬人整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搜糧活動一共搞了40多天^⑦。

甘肅省通渭縣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裏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

在農民備受摧殘的時候，1959年9月25日，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知識與力量》第8、9期合刊上發表了題為〈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的文章。這篇文章認為，按照中國的平均緯度，接受的太陽能轉換成碳水化合物的乾物質，每畝糧食產量應為7.8萬斤，扣除陰天和非生長季節，也應有3.9萬斤。這篇文章使幹部相信，農村的確藏有大量的糧食。

六 政府的糧食庫存比農民生命更重要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從表2的糧食庫存數中可以看出，在這期間，全國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59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這是貿易糧（每噸貿易糧相當於1.2噸原糧），折合原糧為約480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政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表2 大饑荒年代糧食庫存

（貿易糧，億斤）

年份 月份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7	354.85	388.94	338.79	265.88	157.46
8	401.90	398.71	395.84	289.11	191.30
9	486.31	417.23	503.15	341.02	234.81
10	560.21	418.12	655.21	386.93	304.95
11	690.66	658.02	887.03	540.08	460.57
12	756.91	748.43	848.98	572.11	490.02
1	725.08	714.42	764.15	510.35	438.79
2	676.75	654.56	673.19	444.50	394.88
3	601.66	556.01	544.54	359.83	328.86
4	507.62	433.50	403.51	267.89	257.98
5	404.53	319.00	286.22	190.86	200.92
6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當信陽100多萬人死於飢餓時，河南省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存在庫裏，湖北省至少有13.22億斤糧食存在庫裏。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

糧食部另一個數字說1960年6月30日，全國糧食庫存為301.48億斤，其中河南25.07億斤；湖北13.22億斤^⑧。從這些庫存數字可以看出，當信陽100多萬人死於飢餓時，在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存在庫裏，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億斤糧食存在庫裏。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800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近50斤糧食，根本不會餓死人！政府千方百計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甚麼見死不救？

七 餓死人最多的時候，食品出口最多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國家卻大量出口糧食。按生產年度計，與1957年相比，1959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2,505萬噸^㉔，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比1957年的209.26萬噸多了近一倍（見表3）。這一年，中國的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紀錄，達415.75萬噸。這個數字是貿易糧，415.75萬噸貿易糧相當於約500萬噸原糧。留給農民的口糧都是原糧，其中大部分還是山芋（又稱白薯、紅薯、甘薯、紅苕）。1959至1961年農村人均年消費糧食量為164公斤，1957年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標準算，500萬噸原糧足夠2,450萬人吃一年。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國家還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

在這期間，國家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見表3）。1960年4月19日，在中央召開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先念再一次強調了加強肉、蛋等出口商品收購問題。當時農村已經餓殍遍地，沒有飼料，豬長得又瘦又小，幾十斤就收購走了。李先念說：「豬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豬而是狗豬。香港挖苦我們，把我們出口的豬燒掉了，說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為甚麼賣掉呢。捷克總理西羅基給周總理寫信抗議，說：一是交不了貨，二是交來的不敢在市場上出售，質量太次。」還說：「今年一季度2.6萬噸豬的出口任務只完成一萬零幾十噸，這樣不行。請各省委考慮，既要很好地說服，也要加一點命令。」談到蛋，李先念則要求商業系統「來一個突擊收購運動」，「要採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出口問題」^㉕。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國家卻大量出口糧食。1959年中國的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紀錄，達415.75萬噸。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國家還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

表3 1956至1965年中國的部分食品出口

出口食品 \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糧食(萬噸)	265.12	209.26	288.34	415.75	272.04	135.50	103.09	149.01	182.08	241.65
花生油(萬噸)	3.85	1.93	2.86	4.24	2.66	0.62	0.42	0.81	0.98	1.19
花生仁(萬噸)	35.04	23.93	6.80	6.44	3.45	0.05	0.39	0.33	2.66	5.83
鮮蛋(萬噸)	2.13	3.08	3.84	1.34	1.31	1.11	2.08	2.99	3.19	3.76
活豬(萬頭)	54.46	50.70	79.14	71.87	78.75	37.92	81.79	130.19	164.67	171.86
凍豬肉(萬噸)	12.23	5.41	11.81	10.96	7.43	0.93	0.34	1.54	6.21	14.25
活牛(萬頭)	10.72	8.76	13.50	11.55	9.48	1.12	1.64	2.46	4.98	9.33
活家禽(萬隻)	838	1,222	1,455	612	824	492	659	1,044	1,658	2,141
凍家禽(噸)	4,525	5,890	9,569	4,202	4,755	3,055	2,175	2,963	3,860	4,013
凍兔肉(噸)		221	802	650	926	643	2,304	3,620	2,431	2,680
水產品(萬噸)	4.49	5.78	8.85	8.62	9.46	4.23	4.60	5.94	9.25	12.00
蘋果(萬噸)	4.76	6.67	9.24	10.11	10.75	4.99	6.35	6.02	7.53	8.06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編輯部編：《中國經濟年鑒(1981)》(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1)，頁VIII-47-50；《中國經濟年鑒》編輯部編：《中國經濟年鑒(1982年海外版)》(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2)，頁VIII-47-48，花生仁出口數比內地版多一些。

「突擊收購運動」和「斷然措施」一到基層就成了大規模的暴行。四川省璧山縣獅子公社虎峰大隊在1960年4月收購雞和蛋時，不是按社員實有的雞和可能生的蛋來攤派，而是按人頭下指標，社員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懲罰。

「突擊收購運動」和「斷然措施」一到基層就成了大規模的暴行。四川省璧山縣獅子公社虎峰大隊在1960年4月收購雞和蛋時，不是按社員實有的雞和可能生的蛋來攤派，而是按人頭下指標，不管有雞無雞，不管雞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節，將任務層層下達，社員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懲罰。誰家拿不出雞蛋，食堂就不讓誰吃飯。六隊社員柯政國沒有蛋上交，全家七口人被扣飯。他母親到親戚家借了六個雞蛋上交才解除扣飯。除了扣飯以外，完不成交蛋任務，還不准買鹽、煤油、煙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銷社幹部和生產隊幹部，為了完成雞蛋徵購任務，竟不經社員同意，到社員家強行捉雞。捉雞經常是在深更半夜進行，弄得雞飛狗叫，人心惶惶^⑩。

商業部黨組提供的食品出口數字和表3略有不同：1959年商業部系統供應出口的任務完成了303,000萬元，佔出口計劃的110.8%，比1958年供應出口實績增長了28.9%。其中，豬肉供應出口23.3萬噸，是建國以來出口最多的一年；凍牛羊肉2萬噸，為出口計劃的125%；鮮蛋出口5,200多萬斤，冰蛋出口6,208噸；活家禽出口954萬隻，凍家禽出口7,022噸。此外，還出口蘋果10.2萬噸，桔柑9.1萬噸^⑪。

八 結語

從上文的論述可見，大躍進以前，中國糧食就十分短缺。1958年，浮誇風盛行，各地糧食高產的喜訊頻傳，毛澤東信以為真。國家根據虛假的糧食產量，提高了徵購指標，通過反瞞產私分的方式，用暴力拿走了農民的口糧。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政府還有大量的糧食庫存，並且大量出口糧食，實在是令人費解的荒唐行為。

註釋

- ① 交通大學研究所調查報告：〈解放前洋麥進口情況〉，糧食部歷史檔案，1954。
- ② 章乃器：〈五年來的糧食工作情況——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糧食部歷史檔案，1954，全宗號：180；目錄號：2；案卷號：52。
- ③ 〈關於實行糧食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命令〉，1953年11月19日。
- ④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441-42。
- ⑤ 《大眾日報》（山東），1957年10月20日。
- ⑥ 〈中央轉發中央辦公廳綜合的「關於十六省區缺糧、斷糧、鬧糧情況和各地黨委提出的解決措施的簡報」〉，1958年4月25日。
- ⑦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三）〉（1958年3月20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民間編印），頁36。
- ⑧ 錢學森：〈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中國青年報》，1958年6月16日，第4版。
- ⑨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頁365。
- ⑩ 陶鑄：〈駁「糧食增產有限論」〉，《紅旗》，1958年第5期，頁1-5。
- ⑪ 〈糧食部黨組向中央的報告〉（糧發〔58〕20號），1958年5月20日。
- ⑫ 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札記二則〉，《七一》，1958年第5期。
- ⑬ 〈中共中央批准譚震林、廖魯言兩同志「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載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頁513。

- ⑬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報》，1958年8月11日。
- ⑭ 〈劉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
- ⑮ 〈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載《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頁518-19。
- ⑯ 薛攀皋：〈自然科學研究盲目聽命政治的教訓——荒唐的科研課題「糧食多了怎麼辦」〉，《炎黃春秋》，1997年第8期，頁24-26。
- ⑰ 糧食部統計司：糧食統計表(1962)，糧食部歷史檔案，196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頁141。
- ⑱ 1959年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資料。1962年糧食部計劃司統計的1958至1959年度的徵購數是1,092.02億斤。
- ⑲ 章躍兵：〈圖虛名招實禍的「天下第一田」〉，《炎黃春秋》，1995年第3期，頁33。
- ⑳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714。
- ㉑ 〈全國糧食廳長會議簡報〉，1960年2月9日。
- ㉒ 中央辦公廳、河南省委工作組于桑、武人文：〈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1960年6月18日。
- ㉓ 〈中央書記處1959年10月15日電話會議上李先念同志講話紀要〉。
- ㉔ 糧食部黨組：〈關於當前糧食情況和今後糧食工作意見〉，1959年11月27日。
- ㉕ 糧食部黨組：〈當前糧食購、銷、調運情況匯報〉，1958年10月4日。
- ㉖ 〈譚震林同志在十省市小麥座談會上的總結〉(記錄稿，1959年2月21日)。中共山東省委農村工作部，1959年2月26日印發。
- ㉗ 毛澤東：〈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1959年2月22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52-54；張湛彬、劉杰輝、張國華主編：《大躍進和三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1)，頁170。
- ㉘ 《經濟消息》是國家計委的一個內部刊物，主要是為中央領導人提供決策資料。這個刊物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但是，〈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這一篇文章起了極壞的作用。
- ㉙ 毛澤東：〈關於目前農村集體所有制形式問題的批語〉(1959年2月2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80。
- ㉚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2月27日，引自《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頁200。
- ㉛ 〈王子清同志1960年10月3日關於榮縣一些問題向農村工作部的匯報〉；〈張守愚、劉景周1960年11月30日向省委的匯報〉。
- ㉜ 省、市、縣委工作組：〈鐵嶺縣泛河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總結〉，中共遼寧省委1960年12月25日報送東北局。
- ㉝ 喬培華：《信陽事件》，未刊稿，頁70。
- ㉞ 李立：〈向吳芝圃的報告〉，1960年11月28日，河南省檔案館，1960，卷號：2405。
- ㉟㊱ 〈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甘發〔65〕374號)，1965年7月5日。
- ㊲ 糧食部計劃司統計數字，1960年7月5日。
- ㊳ 《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141。
- ㊴ 在中央電話會議上李先念同志的講話，1960年4月19日。
- ㊵ 〈省委農業檢查團江津組向四川省委的報告〉，附件三：〈關於財貿工作的幾個問題的材料〉，1960年5月3日，頁56-59。
- ㊶ 商業部黨組：〈關於1959年供應出口計劃完成情況的報告〉(〔60〕上海會議文件97)，1960年1月8日。